

为留住古迹身影，“厚着脸皮挨家挨户拍照”

与时间赛跑的访古记录者和他的梦想

原乡

张丰

一人生活中能够有所依托，就不会真正绝望。如果有爱，就有一个坚固的堡垒，就不会有“仇恨社会”的情绪产生。

读初中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点。那一年，在某市一所大学食堂做工的叔叔，失业回到家中。这让人很难接受，因为爸爸和叔叔的亲戚，据说是那个大学的领导。全家一直抱以期望，希望他能帮叔叔转正，成为有编制的教工，再找一个对象，叔叔的人生就算完美了。

虽然年幼，我却是最生气的一个人，发誓要给那位做“校领导”的爷爷一点教训，父亲马上批评我狂妄，但是他也趁机鼓动说：“努力吧，看你将来能有什么出息。”对“有权有势”大人物的仇恨，让我哭了起来。这似乎是电视剧中才出现的场景，但是却真实地发生了。

我对叔叔有很特别的感情，那些年，他都是我们看外部世界的眼睛，他是唯一在城市“工作”的。每年寒假回来，都会带一些城市才能买到的零食，也会带一些城市的故事。他最后一次从那个城市回来，带回来一辆自行车，分散包装，自己再组装起来。后来，我和弟弟就是骑着这辆永久自行车，去县城读了高中。

叔叔并没有哭，他甚至也没有特别愤怒，只是很平静地讲述了事实，在学校食堂做工，要转成正式工希望渺茫，校工的收入又那么低，还不如和别人一起，外出到沿海城市打工，趁自己还算年轻，可以多挣一些钱。他没有任何仇恨的意思，坦然接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

年轻的时候，他娶过一个媳妇儿，但是新娘患有重病，结婚没多久就去世了。这是祖母心中永远的痛，她一直后悔自己没有及时发现，阻止这门婚事，但是在内心中她对新娘子能够治愈何尝又不抱有希望呢。这夹杂着愤怒和懊悔的微妙感情，常常让祖母暗自落泪，有时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叔叔自己倒没觉得有多绝望，他一直比较大度。但是，“死了媳妇”成为他再娶的一大障碍，家境普通，个人条件也不算特别出色，再加上这莫名的厄运，让媒婆敬而远之。后来，他决定投奔在城里某大学当领导的叔叔，多少也还有点换一个环境的意思。婚事一度出现转机，食堂一位同事介绍了自己的表妹给他，即便在几百公里外的老家，我也能从祖母和父亲闲聊其间的交谈中，捕捉到叔叔正在恋爱的信息。但是，很可惜，最终还是一场空。

等我考上大学，路过那个城市，去看望已经从高校退休的四爷爷（也就是叔叔的叔叔），才得知这段爱情另外的细节。女方还算是不错的人家，也认可叔叔的踏实，但是对叔叔的不懂浪漫却非常鄙视，这是别人无论如何也都改变不了的。我已经比几年前成熟了很多，也理解了四爷爷的苦衷。他是没有能力帮叔叔实现“转正”的，退休前，他早已被边缘化了。事实上，很多老家的乡亲投奔他，到这所大学的附属医院看病，已经给他造成了不小的负担。

但是，我也再次愤懑起来，不是对四爷爷生气。我认识到自己身上有很多和叔叔相似的地方，在农村长大，不懂城里人那一套浪漫。要再过很多年，我才从这种愤怒中缓和下来，开始尝试以另一种眼光来打量世界，但是这种愤懑的残余一直难以清除，面对一些不公，会突然迸发出怒火。

叔叔却没有这种怒火。这不是说他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都感到满意，只不过他心中已有更重要的事情。我和弟弟考上大学后，他拿出打工存下的一万多块钱，作为我们的学费。他还有自己的老母亲需要照顾，他单身一人，反而可以更方便地和祖母生活在一起。每年过年，他都焕发出孩子才有的热情，买鞭炮，贴春联，尽量为祖母营造节日气氛。

他心中有一个更大的“情感共同体”，除了自己的家人，他对邻居的事情也比较上心，慢慢的，他成为了周围世界的一个纽带，周边人物的一些矛盾，有时候还要拜托他解决。这种“关系”，本质上就是他的世界，也是他生活的一个堡垒，靠着这个，他可以理解自己的处境，迎接一个又一个明天。

这就是牵挂，一个人对世界有了这种牵挂，就会真正地“爱这个世界”。我们都需要去寻找、建设这个共同体，走出自己的封闭世界，去和自己心中“愤懑的残余”进行周旋。

有牵挂，就会「爱这个世界」

程开了五六个小时，一路上颠得他几乎失去了知觉，飞扬的沙土让他的头发都变了颜色。回程时天已擦黑，食宿均免费。第二天一大早，士兵开着警车直接把他从宾馆接到飞机场，刘拓挨个跟他们拥抱告别，自己在飞机上则哭得跟泪人似的。

一个人在中东访古，害怕孤独在所难免。刘拓回忆说，在黎巴嫩的一个晚上，他独自走在荒芜的大街上，只有街边的小卖铺亮着灯，三三两两的黑影从小卖部前闪过，街的深处传来噼里啪啦的枪声，他只能硬着头皮在街上找旅馆。“当时汗毛都立起来了，真是第一次感到这么恐怖啊。”刘拓说，特别害怕的时候就是街上一个人也没有，还不知道哪里枪响。

然而，最常见也最让他感到委屈、绝望的就是路边的检查，大多数时候他解释了自己的来意后是可以通过的，但也会遇上麻烦。2015年，他在伊拉克被政府军误抓关进了监狱，从此刘拓这个普通的大男孩被公众所熟知。

那是在街头检查点，他们清点刘拓的东西后，叫两个军人把他关进了一个很破旧的监狱。监狱条件很差，每个牢房只有20平方米，却关了40多人，由于空间有限，晚上只能轮流躺下睡觉。伊拉克在7月的时候每天气温高达50多摄氏度，但每个监狱只有一个很小的空调，他待在监狱的2周内就热死了2个人。

但里面的人对他很友善，叫他一起吃饭，把凉快的位置让他躺着睡觉。每当自己心情低落时，监狱里最好的朋友奥马尔就会给他讲听不懂的笑话、做鬼脸。而刘拓也教他们唱昆曲、写汉字。最后，他从监狱里被释放时，挨个跟狱友们击掌、握手，受到不能自己。“伊拉克就是这样的国家，既会遇到最险恶的怀疑，也会遇到最无私的帮助。”

盼望古迹消失的脚步慢下来

游历了不少中外文明古迹后，刘拓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颇有感触。其中最明显的是，各国对文物管理方式有较大差异，有的国家管理较粗放，而有的国家则非常严格。例如在埃及，有的文物非常珍贵，但却没有设围栏，游客可以零距离接触，然而在韩国则只能远远地观看，在日本能拍到的博物馆都没有几家。刘拓说，这除了与文物保护有关外，还可能与版权等有关。

与国外相比，刘拓认为我们应该停止对古建拆迁的步伐，保持文化传承有序。2013年刘拓第一次出国是去日本看古建筑，那里文化传承的连续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保存最好的寺庙，也只有建筑、塑像和壁画是完整的，但日本古建筑里的藏书、陈设、供品，甚至挂在帐幔上的小物件都是几百年上千年的。”在中东国家中，除富有的沙特阿拉伯拆得比较凶外，其他国家城建普遍速度慢，更多的是自然更新，虽然这样也面临新旧杂居，看起来乱七八糟的威胁，但至少机理还在。

“考虑到文化的多样性，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不用拆，现存的量已经很少了。”刘拓说，不能说只留下最好的民居、庙宇等就够了，而不知道从底层到高层是如何梯度变化的，也不知道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性。

此外，刘拓发现，民间信仰有所断层，导致大量庙宇类的古建筑失修、倒塌，有的门被锁住甚至连村民也进不去。他建议，可以改变古建筑用途，恢复其公共场所的功能，将其重新利用起来。对于级别较低的文物，地方政府可以出台一些激励政策，调动民间力量的积极性，以解决失修问题。“我最不能理解的是，本来是一条老街，非要拆了恢复明清盛世，改成仿古建筑。”刘拓说，现在很多人依然不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还得自上而下扭转观念，做出几个“古为今用”的样板来。

“28岁的刘拓10年来参观了约1200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150处世界遗产，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和中东地区。这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正在与时间赛跑，希望用镜头尽可能多地留住那些原汁原味的古迹身影”



▲杨珣(唐玄宗时期宰相杨国忠之父)碑。记者看到图片上的杨珣碑高大厚重，虽然孤零零地矗立在田野里但保存完好。 刘拓摄

于毁灭性的，一点挽回的余地也没有。”刘拓遗憾地说，他把这件事曝光到网上后引起广泛关注，后来景区还被罚了很多钱，但是被破坏的东西却再也回不来了。

类似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给刘拓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安城隍庙。刘拓介绍说，2010年2月他第一次来到城隍庙，被它宏大的规模、精美的戏楼、高大的牌坊、宽阔的大殿所折服，虽然很破旧，但不难想象它昔日的繁华。然而，他看完10天后，城隍庙就启动了大修，2012年年初，修缮完工的大殿和原貌差别较大。刘拓说，除了鸡肋、翼角有变化外，大殿被整体抬高，殿前台阶也由原来的2层变成了9层。

虽然有些文保措施是积极的，但开放空间的缩小也让他感到遗憾。2011年，刘拓到陕西法门寺访古，在路上偶遇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珣(唐玄宗时期宰相杨国忠之父)碑。记者看到图片上的杨珣碑高大厚重，虽然孤零零地矗立在田野里但保存完好，碑文历经千年依旧清晰。“第一眼看到时就觉得很震撼。”回忆往事，刘拓感到非常幸运，他说当时网上查不到杨珣碑的照片，2013年年初等他再去拍的时候，当地正在修建碑亭，后来外面又修建了院墙，现在已经很难再拍到它的原貌。

“像应县木塔、香山碧云寺清代塔等都已不让人攀登了，所以现在但凡能上楼，我就倾向于先上一下，或者能下墓葬我就先下去一趟。”刘拓说。

正因为此，遇到紧迫情况，刘拓不得不抢时间。2012年，他在网上看到长江上游要修一个水电站，而淹没区的古建筑看上去挺不错，于是他匆匆地赶了过去。刘拓打开一个县城老街道的照片感慨地说，当地一处省保单位有两个非常好的重檐歇山顶大殿，都是明代建筑，里面还有悬塑，可惜也被拆除。他庆幸自己去得早，因为很多文物在他拍过后就消失了。

近年来，刘拓共走访了约600个县，拍了近350个县的街区。回来后，他会按照省、市、县、街

区将资料整理归类。“遇上好的街区，我就一家一家去拍，所以积累的这份资料信息量还是很大的。”刘拓说。

“现在去中东，你还有记录它原始状态的机会”

这样的紧迫感也让刘拓瞄准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又可能发生很多变化的中东地区。“现在去中东，你还有记录它原始状态的机会。”他说。

2014年上半年刘拓开启了中东地区之旅，他以中东为核心，但又不局限于中东国家。他先去了埃及、黎巴嫩、约旦、土耳其、希腊5个地中海沿岸的国家，下半年又去了中国以西的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库曼斯坦。参观了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古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后，2015年，趁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重新开放，刘拓又有了探访两河流域古文明的兴致。于是他就到了伊拉克，之后又去了沙特、阿曼、也门、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刘拓拍摄了很多珍贵的影像，例如阿富汗位置偏僻但十分精美的贾穆宣礼塔、叙利亚保存完整的大马士革城、也门希巴姆用生土夯筑的民居、利比亚街巷开在房子里的古达米斯老城、伊拉克著名古城遗址巴比伦和泰西封等。“拿阿富汗世界文化遗产贾穆宣礼塔来说吧，第一眼看到它时那种视觉冲击毕生难忘。”刘拓介绍说，这座塔高68米，是世界第二高的宣礼塔，位置非常偏僻但砖雕图案精美至极，风景非常独特。

为了看到贾穆宣礼塔，刘拓历尽艰辛，但也收获了感动。他告诉记者，越是战乱国家，游客越少，民众越热情。刘拓乘坐只有30人的小飞机到达恰赫恰兰后，刚下飞机就被带到了警察局。幸亏他们的长官会说英语，了解了他们出行的目的后，那位长官叫来十几个士兵，开了两辆皮卡，车上还架了两挺机枪陪同他前往贾穆宣礼塔。100公里的路

本报记者王学涛

见到刘拓是在北京大学校门外的一间咖啡屋里，他看上去微胖、爱笑，非常随和。虽然感冒了，但依然和记者聊到了夜里11点多。

28岁的刘拓是个名副其实的旅行达人，10年里他参观了约1200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150处世界遗产，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和中东地区。这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正在与时间赛跑，希望用镜头尽可能多地留住那些原汁原味的古迹身影。

走上访古路

刘拓出生于云南，跟随父母在陕西长大。18岁之前他常跟随喜欢旅游的父母出去旅行，尤其爱看植物。浙江百山祖、天目山、贵州梵净山等都是他常去的地方。“像我们这样的人一般都有收集癖好，看植物、集邮、访古迹……”

热爱上古建筑是在2008年。这一年，18岁的刘拓被保送到北京大学，第一次脱离父母的怀抱一个人出去旅行。刘拓回忆说，因为不用参加高考，他有半年时间可以在外面玩，期间一共去了10余个省份。

刚开始，刘拓参观的是像晋祠、云冈石窟一样知名的旅游景点。要找寻这样价值高的文物，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无疑是很好的帮手。

从1961年至今，国家共公布了7批4296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他参观湖北武当山，上山前购买了一张地图，上面标有当地所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位置和批次，于是他按图索骥前往。“当时没有一个游客，但古建非常好，一点都不比卖门票的古迹差。”同年4月，他又跟随两名古建筑系的校友到天津独乐寺考察，刘拓说那是他第一次看到中国早期木结构古建筑，“真的被震撼了！”

从向父母要钱，到现在自己挣钱，刘拓把收入和业余时间都用在访古上。2016年9月7日，他在新浪微博上发表了博文《纪念去过的国保单位突破1000！》，当时他到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有1029处。而截至2018年8月，他已经去过150处世界遗产，主要集中在中国和中东地区，其中12个因为战乱风险被评为濒危世界遗产。

刘拓心里清楚要发挥自己的长处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他喜欢往外跑且擅长与人沟通。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能厚着脸皮挨家挨户拍照”。虽然后来多次去中东国家，但实际上他只会说英语这一门外语，很多时候靠的是比划动作。由于做过地质和考古调查的原因，刘拓会收集资料一样，从各个角度大量拍照。同时，他也希望自己拍到的图片能有用处，于是有人做研究向他要资料，他就直接给了。

“记录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刘拓说，有的古迹在网络上没有相关信息，有的古迹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改变，而他至少给文物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走访了约600个县，拍了近350

个县的街区

刘拓一边熟练地打开一个个文件夹，一边告诉记者，随着他调查深入，范围“大”到各个级别的文物，当看到因偷盗、塌毁、修坏、拆除、开放面积缩小等原因，部分古迹发生变化后，一种紧迫感油然而生。

2011年，刘拓到了辽宁朝阳市云接寺访古，看到娘娘殿内有精美的清代壁画，人物神情栩栩如生、绘画线条简洁流畅，但由于年久失修，壁画部分已经脱落。时隔两年，他故地重游时惊讶地发现小庙已经整体翻修，内部的壁画也被新画完全覆盖，大红大绿惨不忍睹。

“刚开始我还以为找错了地方。像这样的修缮属

寻找在“核爆心”拍下这张照片的人

胡洪波

2018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神兵钩沉》，这本书是典型的兵写兵。参加1978年马兰核试验的陆军207师防化连的官兵，在40年后，都已花甲的年龄，把那段经历写了出来。当年战前动员，首长要求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烂在肚子里”，现在终于可以说了。笔者有幸参加了新书发布会。

本书的主编是开钢，就是从那个连退伍的，后来在国家机关工作。我和他是第一次见面，他们是陆军，而我是海军，他们的兵龄也都比我大，为啥我们成了朋友、战友呢？这都是一张黑白老照片引来的缘分。

1978年初，开钢所在的防化连参加核试验，任务就是在核爆后第一时间，到达爆心，完成取样。任务艰巨，使命光荣。这张照片，就是在进入爆心前，官兵们的合影。照片里的人，40年后，都找到了，但当时给他们拍这张照片的人，却一直没有找到。开钢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就想找到这个人，这个人叫张海，当时都叫他“张参谋”。

我有一个军校女同学，在公安部工作，和开钢曾共过事，也聊到了找张海参谋的事。在开钢眼里，张参谋是个很时尚很有现代味的军人，他经常骑着摩托，佩戴手枪，戴着墨镜，穿着大头鞋，挂着一个那时十分少见的照相机，还经常带战士们打柴，在大漠上掀起阵阵狼烟。

开钢说完，我这女同学就笑了：“你说的这个张海，和我军校同学好像啊。”于是，女同学就把这张照片发给了我，把开钢的微信推荐给了我，我就和这件事情关联上了。后来开始帮他们找张海。

找一个40年前的参谋，是件很难的事，上哪儿找呢？我认真地看了这张照片，看了开钢写的文章，



▲207师防化连官兵进入爆心前的合影。 张海摄

被那一代军人的事迹深深感动。感动了，心动了，就有办法了。因为他们是参加核试验的部队，而我与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玉将军之子张旅天熟悉，我就联系张大哥，请他帮忙。很快，张大哥回话，找到了张海妹妹的电话。这样，通过张海妹妹，找到了张海的手机号码。

为了把事情办好，确认张海就是彼张海，我照着号码打过去，但对方就是不接，两三天，打了十多次，他都不接。现在骚扰电话多，可能他把我的电话当成骚扰电话了。急中生智，先给他发短信。要在短信里把这个事情说明白，就得挑重要的说，我想到的关键词是“207师”和“核试验”。于是

给张海发出这样的短信：

张参谋你好，207师部分参加过核试验的老战友找您，方便请回电。

几分钟后，对方回复：

你好！我是张海，请问尊姓大名？怀念在戈壁滩同甘共苦的战斗生活，非常高兴恢复与战友的联系，常联系，多保重！

还是战友亲切啊！能叫他张参谋的人，一定不是半路朋友、战友，就是从那片蘑菇云下走向心灵的通行证！就这样，我找到了张海，和他通了电话。

他告诉我，他并不是防化兵，而是军里主管交通和车辆的参谋，到207师防化连去，是为做好核

试验取样车辆保障工作。这样，他才和防化连的战士们一起生活了几个月，给战士们拍了一些照片。

不过，这次《神兵钩沉》新书发布会活动他参加不了，因为他们全家定好了，要到成都自驾游，车子已经通过火车托运到成都了，他们坐火车过去，刚好订的是18日的火车票。

在交谈中得知，穿越核爆心取样工作非常危险，为了减少核辐射，每个汽车驾驶员只能驾车进一次爆心。但是后来，驾驶员不够用了，没人开车，关键时刻，军机关参谋张海，从来没有受过防化训练的张参谋，自告奋勇，穿着防护服，驾着汽车，穿越核辐射区，进抵核爆心，然后下车，背起铁箱子，人工测量原子弹弹头……

我们就是用这种精神搞出了“两弹一星”，我们就是用这种精神筑起了共和国钢铁长城！

我脑海中的张海，不仅仅是那个“骑着摩托，佩戴手枪，戴着墨镜，穿着大头鞋，挂着一个那时十分少见的照相机”的风流才子，更是一名大无畏的军人，一名真正的军人！后来在我的邀请下，张旅天推迟了外地的活动，参加了新书发布会。当开钢主编制作的幻灯片打出核试验基地张蕴玉司令员和另两位都姓张的副司令员的照片时，张旅天又说出一个秘密：书中写到的这次核试验，他也参加了，在装甲兵大队。而这次核试验的总指挥，就是张旅天的父亲、开国将军、我国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玉，副总指挥，就是张海的父亲、时任国防科工委副参谋长张英。

这就是当年的将军和将门家风，他们都把自己的儿子，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放到最危险的核试验第一线去！

张海今年70岁了，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见到张海，但我再一次见到了中国军人的绝代风流！